

女性主义和平学

李英桃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女性主义和平学

李英桃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主义和平学/李英桃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208-10689-5

I. ①女… II. ①李… III. ①女性主义-和平学-研究 IV. ①D0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5610 号

责任编辑 王子夔

封面装帧 王小阳

女性主义和平学

李英桃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6 插页 4 字数 381,000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689-5/D·2071

定价 55.00 元

序 言

看国际问题,视野非常重要,既需有对历史纵深的了解,也要有纵览天下大势的胸襟。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们既要看到国际上正在形成的新政治经济格局,也要关注国际上的人文新景象。我认为,女性话题已经是国际人文新景象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

以妇女参政为例。数据表明,截止 2012 年 2 月,世界政坛同时有 33 位女性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在位。数据还显示,截止 2011 年年底,全世界有女性议会主席、议长或发言人近七十人,覆盖众多欧洲、非洲、拉美和亚洲国家。

在国际上,妇女参与决策在 1990 年以后,特别是 1995 年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后有了迅速的发展。在 2012 年 1 月份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女性领导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实际上,是这两位女性主持并主导了今年的达沃斯论坛。

与女性参政的数字同时上升的是众多的国际性妇女论坛。如世界妇女大会、世界女性经济与社会论坛、世界女性论坛亚洲大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等。此外,在一些大型国际会议召开的同时,还会举行有关的妇女分论坛,比如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环境与发展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等。讨论议题有“平等、发展与和平”、“健康、教育与就业”、“妇女的新责任”、“在我们的社会建立信任”、“共享进步、创造未来”、“水、财富和权力”等等。从这些议题设定可以看出,女性话题既承载过去,也面向未来。这些议题表达了一种人类的崇高情感和共同追求,体现了女性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丰富的想象力、对分享生命的责任和关怀。在世界范围内,这些题目不仅对女性而言有

着很强的生命力,同时也吸引了众多男性。女性议题往往是国际交往中的“柔性”议题,多数内容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共识,能够比较自然地占据道德高位。

对女性自身的“自我唤醒”,中国妇女有着切身的体会。20 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更是一场大思想解放运动。近百年来,中国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交叉与交织中不断探求、自我定位。这个大历史运动适应世界潮流,也远未有尽头。

本书作者李英桃教授曾是我指导的第一批博士生中的一位,不过这已经是近二十年前的事情了。记得我建议她的博士论文做国际关系中的女性议题研究时,她很兴奋,又有点茫然,但是坚定地说自己不怕吃苦,因为“喜欢这个题目”。后来,她的确吃了许多苦,读了大量的文献,还远赴英美收集资料档案,圆满地完成了博士论文写作并出版。其实,我当年建议她做女性题目,也冒了一点险。一方面,我的确看到国际上尤其是西方女性研究的趋势,认准这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另一方面,我也在看周围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因为题目再好,如果研究者自己没有感觉,那是做不出来的。当时认同这个研究方向并大力支持这一研究工作的,还有王逸舟教授。实践证明,英桃不仅把第一步的工作做出来了,而且还不断努力和追求,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她自己也已经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北外“社会性别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在中国的女性研究中做了不少开创性工作。我们衷心希望,英桃和北外的年轻朋友们会以更开阔的视野关注世界和中国女性话题的开展,为国际女性研究添上浓墨重彩的中国亮色。

袁 明

2012 年 4 月 北京

目 录

序言

引言 把和平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

- 第一节 本书的写作背景
- 第二节 “对话”和平研究
- 第三节 “收获”本土智慧
- 第四节 女性主义和平研究的思路
- 第五节 本书的主要结构

导论 女性主义和平研究综述

- 第一节 女性主义和平研究发展的背景
- 第二节 女性主义的和平定义与未来愿景
- 第三节 对实现和平途径的女性主义思考
- 小 结

上篇 实现消极和平

第一章 战争与冲突中的妇女角色

- 第一节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女性主义分析
- 第二节 妇女与战争关系的历史追述
- 第三节 超越受害者与加害者
- 小 结

第二章 战争、暴力与女性主义和平关怀

- 第一节 世界妇女和平运动的特点与新进展

第二节 消除直接暴力、实现消极和平的理论与实践

第三节 妇女在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中的角色

小 结

第三章 社会性别与家庭暴力

第一节 家庭暴力：一个和平问题

第二节 从社会性别角度剖析家庭暴力

第三节 家庭暴力问题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的转移

小 结

下篇 通往积极和平

第四章 社会性别与消除贫困问题

第一节 贫困、发展与和平

第二节 “贫困女性化”与妇女可行能力分析路径

第三节 消除贫困 促进妇女发展

小 结

第五章 社会性别与生态环境问题

第一节 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和平问题

第二节 社会性别与生态环境问题

第三节 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

小 结

第六章 社会性别与全球妇女健康问题

第一节 健康是一个和平问题

第二节 妇女的健康权与生育健康

第三节 社会性别与艾滋病

小 结

第七章 文化和平：社会性别与和平文化建构

第一节 文化暴力、暴力文化与社会性别

第二节 和平文化与和平教育

第三节 社会性别平等的和平教育：微观范例与发展方向

小 结

结论 中国语境中的动态三维女性主义和平观

后记

引言

把和平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

“20 世纪将作为一个以暴力为标志的世纪留在人们的记忆中。”¹无疑,国际和平研究就是血腥的 20 世纪,甚至可以说是冷战背景下的特殊产物。

随着冷战的结束,在以两极格局为特征的冷战中发展起来的“和平研究”的命运将如何呢?在本书开卷前,笔者首先提出三个问题求教于方家:第一,对于国际政治学者来说,“和平研究”是已成为“明日黄花”,丧失了其研究的价值呢,还是仍具较大的现实意义与研究的可能性?第二,对世界各国的妇女来说,是“和平”已经实现,故而无需进一步阐释了,还是“和平问题”仍然极为迫切,需要好好地研究论证?第三,在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今天,中国与妇女为国际和平研究与和平话语的建构已经和能够做出怎样的贡献?中国积极参与到和平话语建构中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的确,社会性别(gender)研究处于国际政治研究的边缘,和平研究同样处于国际政治研究的边缘。但是笔者强烈地意识到,在中国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 21 世纪,在中国语境下结合社会性别与和平研究,讨论当今世界通往平等、发展与和平之路,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价值。1956 年,邓颖超向世界各国妇女呼吁:“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相信,只要各国人民和妇女更进一步地加强团结,把和平的事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就一定能够赢得和平,赢得更大的胜利!”²是的,把和平事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掌握在中国妇女手中,这是本研究得以持续的动力。

第一节 本书的写作背景

“Glocal”这个由全球“global”和本土“local”组成的新词在当今世界非常流行,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今时代的特点。笔者曾经就此词的中文译法请教于不少英语专家和国际政治学者,但很难找到一个一致的译法。常见到有“全球本地”、“全球在地”、“全球本土”等译法,表达的是“全球化与本土化双向发展”的意思。“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 International FOEI)的创始人戴维·布劳尔(David Brower)曾提出“思考全球化,行动地方化”(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口号。³“Glocal”正是向生活在地球上的个人、群体、社会、国家提出了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的要求。本书暂且将这样一个时代称为“全球本土化”的时代,并在此时代背景下,立足中国本土,讨论女性主义和平研究。

近年来,中国学者越来越重视和平研究,尽管仍然是少数,一些专著、教材与论文开始陆续出版。例如南京出版社出版了和平学丛书,其中有译著如日本学者池尾靖志主编的《和平学入门》、挪威学者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的《和平论》、美国学者大卫·巴拉什(David P. Barash)和查尔斯·韦伯(Charles Weber)的《积极和平:和平与冲突研究》等;⁴教材与专著如刘成的《和平学》、熊伟民的《和平之声——20世纪的反战反核运动》等。⁵2005年上半年,中国海峡两岸的女性主义学者不约而同地发表了与和平学相关的文章。⁶2005年年底,由本人主持的“女性主义和平研究”项目有幸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的资助。

从2005年年底项目得到批准到2007年夏天,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笔者与李洪峰、郎平、何佩群等学者曾做过多次研讨,对大纲进行反复修改,大家为项目贡献了大量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但是,作为项目负责人,深知女性主义和平研究在中国还相当稚弱,尚未形成学科体系,笔者一直犹豫、思考着,本书以何种方式进行女性主义和平研究,才能让这个课题在世界这个大平台上反映出各国学者研究的新成果,融入中国的历史经验与价值观念,并逐渐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接受,

并产生共鸣,最终为女性主义和平研究尽一份心力。

在书稿各章初现雏形时,笔者和课题组的成员遇到的最大挑战正是在如何在借鉴世界各国女性主义与和平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展现出女性主义的关怀,清晰表达中国与中国妇女的经验——本书的贡献在哪里?厚厚的一沓书稿捧在手里,笔者却迟迟没有交给出版社。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做课题的五年多的时间里,本项目组的几位成员通过国际学术交流与亲身经历,不仅收获了和平研究的理论知识,更收获了和平观念与和平智慧;在转变思维方式的同时,实现从人的内心一直到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的转变。

第二节 “对话”和平研究

2007年7月2—21日,笔者作为由中国教育部、北京大学与美国东西方中心、夏威夷大学联合组织的“中国教授赴美考察团”的成员之一,前往美国的夏威夷、旧金山、亚特兰大和华盛顿特区考察。为时20天的美国之行,成为笔者打破写作困境、开阔视野的良机。其中有几件事情很值得一提,它们将笔者关于和平思考的链条一点点地连接起来,形成了一条相对清晰的研究线索。

一、对话卡特中心

访美期间,代表团参观了卡特中心,笔者在那里与相关人员讨论了和平的概念问题。代表团首先观看了关于卡特中心的宗旨、原则与主要成绩的录像片。中心的三大使命可以概括为:致力和平、与疾病作斗争和构筑希望(waging peace, fighting disease, building hope)。⁷卡特中心的和平项目设有五个子项目:民主、人权、冲突解决、美国和中国。参观之后,代表团成员与卡特中心负责人进行对话。作为女性主义与和平学者,笔者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卡特中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致力于和平,那么,你们是如何界定和平的?”为了避免歧义或答案太泛,我补充道:“当然,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第二,卡特中心在社会性别主流化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对于第一个问题,对方回答说:“和平当然

不仅仅是没有战争。”但显然没有估计到会有人问这种关于概念的“大问题”抑或“小问题”，他想了想又补充说：“和平可以被理解为‘构筑希望’。”对于第二个问题，他坦率地指出，卡特中心还没有专门针对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项目，但他们在机构建设、人员录用方面十分注意性别平等问题。

二、中美女性主义学者间的倾谈

笔者这次访美的一大收获是结识了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角色》的作者琳达·林赛(Linda L. Lindsey)，并就和平研究的内容问题与她交换意见。

我们的倾谈是从健康开始的。在她介绍自己正在进行的妇女与健康研究时，笔者向她提出了“如何理解健康”或者“什么是健康”的问题。她解释道：“健康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除了生病等我们通常的理解外，还有贫困、暴力和其他不平等给妇女带来的身心问题等。”尽管笔者对健康问题几乎从未涉猎过，这时却突然意识到林赛所研究的健康问题与笔者所研究的和平问题之间的联系，我理解她的意思了，于是接着她的话头说：“就像在和平研究中，和平的定义不仅仅是没有战争。”她紧接着说：“对，健康也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接着，我们开始探寻彼此研究重合的领域，的确能找到很多，比如暴力、贫困、环境问题、全球化给妇女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等等。

三、拜谒马丁·路德·金

2007年7月12日，代表团一行前往位于美国南方重要城市、1996年奥运会举办地亚特兰大的马丁·路德·金中心参观。在这里，笔者对实现和平的途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对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博士在美国民权运动中的影响力和他所继承发展的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每一个学美国史或从事和平研究的人都耳熟能详。然而，真正走近金博士时，更为真实的和平观念迎面而来，笔者更加相信本书主题——“和平”的力量。在中心花园的草地上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的不是“请勿践踏

草坪”，而是“世界和平从我开始”。这个牌子让人立刻认识到，这里是一个传播和平理念的不朽伟人长眠的圣地。进入展馆，映入我眼帘并产生深刻共鸣的是金博士沉思的照片以及上面的几行字：“我的朋友，不再是在暴力和非暴力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要么非暴力要么死亡的问题。”⁸

四、与美国华人和平研究者交流

华盛顿特区是代表团考察的最后一站，这一站的最后一个大型活动是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为代表团举行的晚宴。在晚宴上，笔者遇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上半叶就来美国求学，现在马里兰大学教育学院执教的林静教授。与她的深谈则促使笔者进一步回答“自己能为实现和平做什么”的问题。

林静教授近年来一直在从事社会性别与和平研究，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教育的发展、改革与挑战。2001 年“9·11”事件以后，她在马里兰大学率先开设了和平教育的研究生课程。2005 年，她创立了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和平教育学者协会，并担任了两年主席。目前，林静教授担任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和平教育学者协会的新闻主编。2004—2007 年，她培养了一批从事和平教育课程设计，并在美国许多小学开设相关课程的本科生。2006 年，她出版了和平教育专著《爱、和平与智慧的教育：对 21 世纪教育的展望》。这本书受到同行高度的评价，被一些同行当做教科书采用。这本书还被提名为马里兰大学 2008—2009 年一年级本科生必读书的候选书籍。

交谈中笔者与林静教授同时发现，虽然近 20 年来彼此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却做着相同的研究，与相同的学者、机构、学术组织、甚至相同的基金会共同工作。她介绍了自己从事的和平教育工作，并且正在提出一项动议，与中国的有关教育机构合作，在中国的青年女学生中间开展和平与领导能力教育，为未来培养女性领导人。在与林静教授的谈话中，笔者深刻地感受到，即使是对她这位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在海外从事和平研究的华人学者，对中国正在兴起的和平研究情况也了解不多。笔者随后也向她详细介绍了中国和平研究发展的情况以及自己

所开设的“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课程,强调这门课程的主旨同样是通过教育来广泛地传播平等、发展与和平的精神,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主流。

在交流中,笔者与林静教授达成了许多共识,决定共同合作,为推动中国的女性主义和平研究做些事情。2009年,我们合作完成并发表了《女性主义和平研究:思想渊源与和平构想》一文。⁹

此次国外考察之后,带着“女性主义和平研究”这个课题,笔者又于2010年2月赴日本东京大学访学一个月,并于2010年8月至2011年6月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访学十个月。学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给了笔者很大启发,增强了完成这个项目的信心与决心,更让我确信了这个项目的重要价值——不仅是学术的,也是政治的,更是行动的价值。而所有这些经历都是以学术促和平的例证。

第三节 “收获”本土智慧

“女性主义和平研究”项目组的成员在参与国内外相关活动中所经历和体会到的除了和平的理念与和平的精神,还有诸多重要问题,比如东西方和平研究的差异,“全球本土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和平议题的特点,以及中国各种民间和平力量兴起带来的各种变化等。这些内容对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研究、女性主义和平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和平课程与培训凸显中西方差异

2008年11月,项目组成员郎平前往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参加了由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系等机构共同举办、为期10天的全球和平与安全研究高级论坛(TOPS)。此次培训的内容涉及和平研究的基本概念、冲突研究的趋势、战争的原因以及和平面临的挑战、民主和冲突解决、公民社会与和平、联合国与地区组织、对话与公正以及地区形势等。授课教师以该校和平与冲突研究系的教授为主,也有个别教师来自斯德哥尔摩大学。培训形式以授课与课堂讨论为主。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郎平和其他中国学者在交流中深切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距离。相比较而言,其他国家学者之间的交流看起来更加融洽和易于沟通。因此,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和让中国了解世界可能是中国外交部门和所有涉外人员面临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

2006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将“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确定为教改立项课程,拨专用经费进行建设。该课程于2007年春季正式开课,2008年秋季第二次开课。作为这门课的主讲教师,笔者特别在课程名称后面加上了一个副标题“一项和平议程”,以凸显其与和平的联系。2006年11月2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社会性别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从事社会性别观念倡导、课程建设与学术研究,希望通过课程建设与中心发展,强化女性主义理论与行动在中国的和平建构中所产生的力量。

二、“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网络的启示

从“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GAD)网络中,笔者充分感受到女性主义在中国本土发展的能力与价值。该网络成立于1998年。是年在成都举行的“社会性别、贫困与农村发展”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出了建立社会性别网络的建议。西安“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此建议做出回应:在与会者充分讨论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建立妇女/性别与发展的全国性网络,以便使国内活跃在性别与发展领域中的各方力量能够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加强对话与合作,推动中国妇女的发展。该网络从1998年至今已经成功地组织了多次年会。¹⁰

“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第四届年会讨论通过的《中国社会性别与发展网络约定》指出,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机构的代表和个人,自愿结成非政府、非营利的中国社会性别与发展网络;宗旨是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网络的运作机制和方式是:(1)工作协作小组。网络设立工作协作小组。小组由网络年会选举产生,成员5—9人;成员推选出一名召集人。其职责是与年会筹备委员会共同筹办网络年会,草拟并执行网络年度计划,加强网络建设,促进网络目标的实现。召集人和工作协作小组成员任期不超过两届。(2)年会。年会是

网络成员交流经验、讨论计划的场所。该网络每两年召开一次网络双年会(或称网络大会)和一次专题会议(专题年会)。网络双年会和专题年会交替进行,并在不同地方轮流召开。(3)互联网网站。互联网网站(简称网站)是网络成员之间、网络与社会联系、分享和交流的平台,并发挥向社会传播关于社会性别和发展的理念,推动社会性别意识提升的作用。(4)联络员。联络员是网络成员与工作协作小组、年会筹备委员会和网站之间交流的枢纽。联络员的任期由推选者决定。联络员的主要职责包括:在本地区或本单位网络成员和年会筹备委员会之间协调信息的双向沟通;搜集并向网站提供本地区本单位有关社会性别与发展的信息,供网站工作小组发布,以便网络成员分享。(5)网络接受成员的捐赠。捐赠为现金的形式。工作协作小组代表网络接受捐赠。年会筹备委员会代表网络管理捐赠。捐赠详情在网站和年会上公布,并在年会上接受审议。捐赠用途:奖励联络员,补充年会经费。¹¹

除以上运作形式外,“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网络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电子邮件群组,将国际组织、政府官员、妇联系统、科研机构、高校、本土女性非政府组织、从事女性主义研究的个人以群发邮件的形式联系在一起。其成员既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年会的决议,又可以参与到关于男女同龄退休问题的争论;关注农家女、农民工、艾滋病毒/艾滋病(HIV/AIDS)携带者、性工作者以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面临的问题……网络成员或许此刻还在自己的班上给学生上课,下一时间就将奔赴法律援助工作现场。而一些网络成员又会将另一些成员引进网络、找到新的工作伙伴。大家通过各种方式,包括QQ群、MSN等新媒体新平台交流信息,取长补短,相互支持扶助;共同推动性别平等,致力于改变父权制结构下的各种不平等关系,为促进建构和谐的两性关系、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贡献力量。

参与“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网络活动后,笔者深切地感受到本土蕴藏的巨大能量,这是实现平等、发展、和平的力量。正是因为真切地感知了这股力量,笔者更加坚定了从中国本土出发思考和平问题的决心。

三、邓玉娇案与董珊珊之死的震动

2009年5月10日晚,湖北恩施州巴东县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女服务员受侮刺人案。女服务员邓玉娇受到侮辱后用刀刺死当地招商办主任,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立案侦查。12日下午,邓玉娇被送到恩施州优抚医院进行精神病鉴定。21日,邓玉娇的两位代理律师与邓玉娇在巴东看守所内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之后,“邓玉娇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民间的声音不仅通过各种平面媒体、网络途径表达出来,而且伴随着学术研讨、行为艺术展示、女性学、社会性别学的课堂作业逐渐得到回响,为更大范围的人群所倾听。5月22日,全国妇联的“中国妇女网”发表头条声明,称“全国妇联高度重视邓玉娇事件并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¹²尽管这一声明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作用,但足以显示案件所引起的重视程度。

2009年5月31日,邓玉娇案件侦查终结,警方公布的结论是“防卫过当”。当时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红枫妇女热线等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纷纷发表声明或撰写文章参与讨论。“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网络在邓玉娇案发生后组织了征文活动,并编选结集出《妇女权利何处寻——邓玉娇案社会性别评论专题》。2009年6月7日,巴东县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邓玉娇起诉至巴东县法院。一些网站设立了“邓玉娇案”专题。随后,该案迅速成为了各大网络媒体的焦点,引起全国的高度关注,并蔓延到各大平面媒体和主流媒体。2009年6月16日上午11时,备受瞩目的“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在湖北巴东县法院一审结束。合议庭当庭宣判,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尽管不少女性主义学者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例如量刑时提到的有罪和有病、对三位男性的责任认定等问题。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到,民间力量的动员能力和捍卫妇女权益的勇气都展示了巨大的能力。这种能力正是进行跨界努力、反对各种暴力,实现积极和平的深厚基础与动力。

2009年10月19日,26岁的北京女子董珊珊因“被他人打伤后继发感染,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而这个打她的人就是其新婚丈夫王